



山西通志

中華書局

〔清〕王 軒等纂修
高可 劉英 編

山西通志

第一冊
序言目錄

中華書局

總 審 校 劉 貫 文
總 點 校 劉 克 文
點 校 主 持 高 可

責 任 編 輯 駢 宇 騫
封 面 設 計 衛 水 山

山 西 通 志

(全二十二冊)

〔清〕王軒等纂修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文字六〇三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1/32·412³/₄印張·23插頁·10200千字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數 1—1800 冊 定價：350.00 元

ISBN 7-101-00700-7/K·291

三晉文化研究叢書編輯委員會

總編

趙雨亭

副總編

劉舒俠

劉貫文

李玉明

劉江

陳墨章

張頷

點校序言

地方志是中華民族歷史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份，是中國獨有的地方性百科全書。它以豐富的資料和特殊的價值，受到歷代政治家和學者的重視。

唐韓愈過嶺南，先閱韶州圖經，以瞭解當地滄桑；宋朱熹知南康，下車伊始，即尋郡志。宋司馬光視方志爲「博物之書」，清章學誠稱方志爲「一方之全史」。著名史學家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中說：「夫以方志保存史料之繁富：紀地理，則有沿革疆域、面積分野；紀政治，則有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紀經濟，則有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紀社會，則有風俗、方言、寺觀、祥異；紀文獻，則有人物、藝文、金石、古蹟。」簡要地概括了地方志的內涵。近人瞿宣穎在其所著方志考稿序中，則更明確揭櫫了方志的六大功用：「社會制度之委曲隱微不見於正史者，往往於方志中得其梗概，一也；前代人物不能登名於正史者，往往於方志中存其姓氏，二也；遺文佚事散在集部者，賴方志然後能以地爲綱，有所統攝，三也；方志多詳物產、稅額、物價等類事實，可以窺見經濟狀態之變遷，四也；方志多詳建置興廢，可以窺見文化升降之蹟，五也；方志多詳族姓之分合，門地之隆衰，往往可與其他史實互證，六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新中國的科學工作者，利用地方志資料，爲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有益的貢獻。中央地質部在北京圖書館的協助下編成的祖國兩千年鐵礦開採和鍛冶及中國古今銅礦錄，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編製的中國天文氣象記錄綜表、中央氣象局編製的近五千年來中國氣候的變遷和五百年來我國旱水澇資料、中國科學院地震工作委員會歷史組編製的中國地震資料匯編、中國史學會編纂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地質學家章鴻釗編纂的古礦錄，等等，其中的許多寶貴資料即來自地方志。我國天文學家徐振韜和夫人蔣窈窕利用古代方志中有關太陽黑子活動的記載和變化，查出二十三條關於十七世紀的太陽黑子記錄，其中十六條是在「蒙德極小期」內（即太陽活動的衰落期），從而爲澄清國際天文學界在這問題上的爭論，提出了新的見解，引起了國際天文學界的注意。

國外學術界對我國的地方志也頗爲重視。英國英中瞭解協會會長李約瑟，畢生潛心研究我國科技發展史，在他主編的多卷本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史中，就廣泛參考、引證了我國地方志中的資料。他在對中外古文獻作了對比研究之後說，希臘的古代文化乃至近代英國，都沒有留下與中國地方志相似的文獻。英國著名漢學家偉烈力認爲中國的地方志是任何國家的同類文獻不能比擬的。

無庸贅言，地方志，不僅是我國歷史文化遺產中的奇葩，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極爲珍

貴的寶藏。很好地繼承、開發、利用這批寶藏，剔蕪存菁，去僞存真，繼往開來，不僅是歷史賦於我們的重託，也是人類文明建設的需要。

爲更好地開發利用這批寶藏，考慮到今人和後人使用上的方便，我們於一九八四年底開始，組織省內外有關專家和學者，協作攻關，歷時四年，點校了這部光緒版山西通志。

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對山西通志的點校工作十分重視。山西省社會科學院把點校山西通志列爲院級重點課題，並在歷史研究所內設立地方志研究室（現名地方文獻研究室），專門從事山西通志的點校和工作。

在山西通志的點校、審校、出版過程中，曾任中共山西省委副書記的王克文同志，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副組長、中國地方史志協會會長梁寒冰同志，中華書局總編李侃、副總經理鄧經元、前副總編趙守儼同志，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辦公室，我國著名方志學專家朱士嘉、傅振倫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吳樹平先生，山西省考古所名譽所長、著名古文字專家張頌先生以及北京圖書館李凭博士等，都給予了熱情的關懷和幫助，山西省圖書館及該館知青招待所、山西大學圖書館、北京圖書館，給提供了許多方便，山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也很關心這項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謝。

爲保證本書的點校和印裝質量，中華書局組織了由鄧經元、吳樹平、王文錦、張忱石、

陳抗、姚景安、駢字騫等同志參加的復審班子，其古代史編輯室、出版部、校對科等部門的領導和同志以及新華二廠、北京冠中印刷廠的工人師傅們，通力協作，都對本書的出版給了大力幫助，尤其是鄧經元、吳樹平、責任編輯駢字騫、出版部主任張宇等同志，更為本書付出了大量的艱苦細緻的勞動。他們淵博的學識和無私認真的工作精神，感人至深。在此，也一并致以真摯的謝意。

余智鈍才疏，雖和筆墨有緣，但於方志之學，却屬外行。志在三晉綠，老來情更濃。有幸得予山西通志點校盛事，忝為總審，期能獻微芹於第二故鄉山西父老一二，願足矣。值此點校工作全部完成之際，點校組的同志們囑我寫個序言。數推不得，只好寫了上面這些話。所言極淺，難免謬誤，倘得方家教正，幸矣。

劉貫文

一九八八年秋

點校說明

一

山西通志首創於明成化十一年乙未（一四七五年），由按察副使四川馬湖沐川司胡謐纂修。此前，明永樂十六年，成祖朱棣爲纂修大明一統志，詔天下郡縣衛所皆修志書，并頒發纂修志書凡例，規定了必須具備的二十八項類目。自此，官修志書之風大盛，據文淵閣書目記載，明初山西各府州縣所呈新志，竟達一百零一種之多，然尚無一部省志。成化九年秋，胡謐由山西提學僉事轉山西按察司副使，受巡撫李侃之命創修山西通志。於是，他在公務之暇，訂舊志，參前史，益今建置，旁採見聞，合三司所隸總爲一編。成化十年九月告竣，次年付梓成書，是爲成化山西通志，亦稱胡志。全書共十七卷，分目四十有二。此後，有榆次閻又泉、寧化潘春谷續修，旋因春谷去世未果。嘉靖四十一年，寧州周斯盛以按察司副使督學山西，乃授命開局於河汾書院。於是，以學正林大槐爲編纂，在閻、潘手稿的基礎上，加以續成，是爲嘉靖山西通志，亦稱周志。書成於嘉靖四十二年癸亥（一五六三年），全書三十二卷，分門二十。閱四十八年，萬曆三十九年辛亥（一六一一年），按察使京

山李維楨又續前補後加以重修，是爲萬曆山西通志，亦稱李志。該志計卷三十，分目二十。書成未遑付梓，崇禎二年己巳（一六二九年）始印成冊，有巡撫祝徵補序一篇。滿清入關，政局初定。康熙十一年，保和殿大學士曲沃衛周祚即奏請徵各直省志書備總修大清一統志參考，詔允其請。十三年，學政謝觀命太原府同知開化江南齡督教官曲沃李方蓁等纂修。十五年，定稿後曾聘請洪洞名儒范鄴鼎訂正。十七年，費竭工停。十八年，布政使那肅創捐集資，提學僉事故城劉梅復督李方蓁等續修，書成於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一六八二年）。自謝觀開局至此，五易其稿，歷時九年。全書共計三十二卷，分目亦如卷數，是爲康熙山西通志，亦稱劉志。雍正六年，世宗胤禛復命督修直省通志，供一統志館臣採擇，並詔州縣志書六十年一修成爲定制。七年，巡撫覺羅石麟以原翰林院庶吉士宜興儲大文爲纂修，開局重修。歷時五年，於雍正十二年甲寅（一七三四年）成編，是爲雍正山西通志，亦稱儲志。全書二百三十卷，分類四十。此後，乾隆四十五年庚子（一七八〇年），巡撫雅德爲備高宗弘曆巡幸五臺山時呈覽，苦前志過繁，乃命絳州通判汪本直刪繁就簡，約爲十卷。不以類分，而以府州縣分編，蓋遵大清一統志體例。書成，名曰山西志輯要，並附清涼山志輯要二卷。迄嘉慶十七年壬申（一八一二年），巡撫衡齡偕提督學政湘潭周係英復取雍正通志，正其建置沿革之變遷者，略加增補、分注和校勘，以備仁宗顯琰西巡時呈覽，此即雍正

通志嘉慶校刻本。此後八十年間不再修纂，直至光緒五年，巡撫曾國荃以丁丑、戊寅兩年特大災荒之後，恐文獻無徵，乃倡議重修。於是成立山西通志局，歷時十三年，於光緒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年）編就，是爲光緒山西通志，亦稱曾志。

山西通志，自明成化十一年（一四七五年）至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四百六十年間，除乾隆輯要、嘉慶校刻、民國補版不計，先後纂修六次，明清各三次。大抵前後相因，愈修愈精，青出於藍，後來居上。成化通志，由於首創，文徵不足，借鑒甚少，難免疏漏，然仍以「體例完善，詳略得體」而著稱。且搜集了不少如歷代戶口等極爲珍貴的文獻資料，成爲以後續修通志的依據。四庫全書以其古本可貴，列入史部地理類存目二中。嘉靖通志、萬曆通志，體例皆沿成化通志，然續前補後，增益不少。康熙通志，較前志充實數倍，雖遺缺仍多，然對前志作了不少訂正。雍正通志，博採見聞，較前志又增關隘、武事、封爵、氏族、辯證、遺事、經籍、藝術八類，共四十類，每類之中，又各增十之一二或十之六七，成爲一部卷帙浩繁、包羅萬象的巨著。纂修儲大文，乃一代名儒。他精研地理，於山川形勢，多能得其要領。其辯證一類，專爲補正地理而作，特爲精核。其經籍一類，乃援施宿會稽志、袁桷四明志之例，亦大有助考據。故其書在當時稱爲名筆，四庫全書列於史部地理類一中。

我們這次點校的光緒山西通志，是明清兩代山西最後也是最好的一部通志。它不僅據有一般地方志書「資政輔治」的功用，是我們瞭解省情，建設據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重要參考書，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鄉土教材，而且在學術和文獻價值上講，也彌足珍貴。其優點，舉其要者，大致有七：

第一，書成學者之手。

一部志書的好壞，和該志纂修者學識的優劣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光緒山西通志是由王軒創修，楊篤完成的，因此，瞭解王軒、楊篤的學識情況，對判斷本志的好壞是重要的。

王軒（一八二三——一八八七），字霞舉，號顧齋，晚署壺翁。山西洪洞縣人。早時刻

苦博學，深研三禮、爾雅、說文及輿地，於六書九數，用功尤勤。同治二年中進士，考卷曾被視為樣板，被大學士祁雋藻譽為「石州（張穆）後起有人」。曾任兵部武庫司主事，後歸里，主講河東宏運書院。學識精深，甚獲時譽。光緒五年，受山西巡撫曾國荃之聘，赴省任山西通志總纂，並主太原晉陽書院講席。八年，巡撫張之洞、學使王仁堪在省城創設令德堂，選拔晉省學子之優異者入學，王軒又被聘為總校（相當於今校長）。三晉學子，多受其益，被目為晉省有清一代尊師。主要著作有洪洞縣志稿十六卷，說文句讀識語一卷，十八疊山房唱和集一卷，顧齋文集二卷，顧齋詩集二卷，勾股備算細草九卷等。

王軒受命總纂山西通志後，不僅總覽全編，全書體例，多所手訂，志稿前五十卷均經他親自校對，而且志中太原、河東等部份內容，也大都由他纂修。特別是他親自纂修的山西歷代疆域沿革圖譜，還印成單行本，以圖文並茂，考證精賅，當時即受到朝野贊許。

楊篤（一八三四——一八九四），字雅利，號鞏同，又號秋湄，或署虬麋道人、呂香真逸，晚年自稱東瀛老人。山西鄉寧縣人。同治舉人。早年從名儒王筠攻習說文，通訓詁，長金石，精三禮，好史學，工書法，善琢硯、治印、彈琴。張之洞認為他的篆書勝過錢坫、鄧完白。光緒十九年，北洋大臣李鴻章七十壽辰，山西巡撫送李的屏軸即由楊篤代寫隸字，其書法之精妙為全國第一。光緒山西通志中的金石記十卷，即為他的手筆。因收羅宏富，考訂精確，向為海內外金石家、考古家推崇，曾以山右金石記為書名另行刊印。

楊篤不僅多才多藝，是山西學界一代名流，而且是我國清末著名的方志學家。其一生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方志編纂上，從三十多歲時在主講宏州書院期間創修西寧縣志始，先後編纂了蔚州志、代州志等十二種地方志書，對方志編纂有着豐富的實踐經驗。光緒五年，他被聘為山西通志纂修官後，全部心血和才識就傾注在山西通志上。光緒十三年，總纂王軒病故，巡撫張之洞調離，省通志局經費吃緊，編纂工作困難重重。他力挑修志重擔，總攬全盤，親自編纂校對，雖疾病在身，或嚴冬手指凍裂見血，仍不停執筆。嘗對人說：「一

身之壽夭，命也，倘通志不成，三晉文獻由我而斬，罪不更大乎！」有清一代，像這樣畢生獻身於方志事業的人，不僅在山西，在全國也是不多見的。

王軒、楊篤而外，預修光緒山西通志的其他同仁，如副纂張于鑄，工文墨，長詩詞；「戊戌六君子」之一、分纂楊深秀，通經史，精考據，本志星度譜、古蹟考，即出其手，都是晉省當時學界大家。他如分纂周晉、宋志濂，分修梁卓午、馮志沅等，也都學有所長。

大家知道，地方志除特別優秀者外，一般是地方官限於朝廷功令，招集地方上的一些人甚或鄉曲陋儒修成的。這是地方志書一種先天性的不足。清代，隨着方志編纂的鼎盛，出現了一批如章學誠、楊篤等專門從事方志編纂工作的學者，一些國內名儒如阮元、戴震等，也都參加了志書的纂修，爲提高和保證志書的學術質量，確實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光緒山西通志以山西一代名儒王軒爲總纂，以著名學者、方志學家楊篤爲纂修，網羅當時山西學界名流組成編纂班子，這就從根本上爲克服地方志書的不足和提高本志的學術質量，提供了保證。梁啟超在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一文中，將光緒山西通志列爲少數傑出志書之一，目爲清光緒朝優秀省通志之首，稱其爲「出自學者之手，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應該說，梁氏這些稱譽，是公允的。

第二，體例完備，內容宏富。

王軒、楊篤不僅善於繼承本省舊志的優點，而且善於吸取他省志書的長處。其時，不少著名省志，如謝蘊山的嘉慶廣西通志、阮元的嘉慶浙江通志和道光廣東通志、黃彭年的同治畿輔通志以及郭嵩山、李元度的光緒湖南通志均已問世，故王、楊得以他山之石攻本省之玉，權衡折衷，使光緒山西通志首先在體例上更加完美。全書分圖、譜、考、略、記、錄六門，以括其要。六門之名，皆有所本：圖以辨方，承唐賈耽朱墨二色遺法，以使古今地名互證。譜以序世，本鄭樵通志之意，以與圖合。考以稽古，補圖、譜之未詳；府州廳縣考，體本元和志，山川考，例援水經注。略以紀今，亦依鄭氏通志。記以述事，仿程棊上黨國記。錄以存人，效趙岐三輔決錄。六門之中，又分二十七類，計圖二（疆域圖、府州廳縣圖），譜六（沿革譜、星度譜、三代世譜、秦漢以來別譜、職官譜、貢舉譜），考四（府州廳縣考、山川考、關梁考、古蹟考），略七（田賦略、水利略、鹽法略、秩祀略、學制略、營制略、公署略），記六（巡幸記、荒政記、大事記、經籍記、金石記、風土記），錄十二（名宦錄、鄉賢錄、忠烈錄、孝友錄、義行錄、仕實錄、儒行錄、文學錄、隱逸錄、藝術錄、方外錄、列女錄）。類以下再分子目或附目，條分縷析，井然有序。圖，皆櫛以方里線，近似今圖之經緯線，地望雖不甚精確，然較之舊志，確乎面目全新。特別是歷代疆域圖，由於有朱墨二圖相櫛，使今古地名之異同一目瞭然，圖中附有簡明注文，更使歷代建置沿革眉清目晰。沿革譜，以省府州縣爲

綱，緯以歷代，與圖、考互證互補，簡潔明快。星度譜，僅載與地望有關之北極經緯、節氣交食、晝夜長短、晷影贏縮等，一掃舊志天文侈談分野、占候之荒誕。這種體例，比之舊志和他省通志，確實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顯得更加完備、科學。

完備的體例，使光緒山西通志得以最大限度地擴充了收錄內容。其所輯史料，盛況空前。上起唐虞三代之遠古，下迄封建社會之末期，包羅萬象，應有盡有，凡山西或與山西有關之天文、地理、政治、軍事、田賦、戶口、物產、水利、交通、風俗、方言、氣象、地震、災異、名勝、古蹟、學校、科舉、文學、藝術、經籍、金石、氏族、封爵、方伎、寺觀、釋道以及各類人物等等，無不囊括。舉凡山西歷史上之社會制度、各類人物、政治經濟、文化古蹟等等，不詳或不見於正史者，往往可以從中得到印證和補充。而且史料按地域分類排比集中，更便於研究。正如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總錄序中所說的那樣：「以較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以較報紙，則報紙表其散亂。」實乃晉省一史無前例的博大的歷史文獻寶庫。

第三，訂訛補闕，考證精駁。

清儒崇尚考據，王軒、楊篤、楊深秀又都以考據名家，所以，這種注重考據之風，在光緒山西通志中也得到了非常明顯地反映。志中有「明考」，通篇「考證爲多」者，府州廳縣考、山川考、關梁考、古蹟考、金石記、三代世譜等是也；有「暗考」，間參考證者，沿革譜、秦漢以

來別譜、星度譜及七略等是也。它如專志人物的十二錄，雖無按考明文，但作者蒐真輯佚，訂訛補闕，也不無考證之痕迹。可以說，精於考據，是光緒山西通志的一大特色，也是反映它學術價值的關鍵所在。

在論證某一問題時，光緒山西通志的作者，一般都首先提出自己的論點，接着，將前人甚或同人就這一問題的有關論述排比分類轉引，然後，以「謹按」結語，分析論證，闡明己意。這種方法，不僅給後人對這一問題的再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史料，節省了不少翻檢之勞，而且將其考證的思維脈絡，也表現得清清楚楚，讀來使人確有順江而下，不由然而然的感受。特別是作者用以專門表述己意、論辯駁難的考證文字「謹按」部份，其論證之鞭辟入裏，其言語之潔簡明快，更往往使人誦之出聲，拍案叫絕。如：

卷二三府州廳縣考一太原府下關於太原、晉陽二縣的始名、遷徙、變更的考證，即其一例。爲解決這些問題，作者引了禹貢、春秋左傳、詩、相如上林賦、史記、漢書、水經注、阮籍東平賦、元和誌、太平記以及舊通志、縣志等，排比羅列諸說，最後用「謹按」領起總而論之，提出己意。此按文不長，現錄如下：

太原肇自禹貢，祇原野之統名，晉陽昉於春秋，實城邑之定號。稱名不一，未可強同。洎秦取趙城，從而郡縣。太原久爲雄郡，晉陽代倚郭下，統屬攸分，大